

东洋航路移民

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

曾少聪\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杨国桢 主编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

洋国
海与
中

丛书



总 序

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大国。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环境。现今中国的版图内,有 1.8 万余公里的海岸线,1.4 万余公里的岛岸线,沿海岛屿 6500 多个,5 大海域的海洋国土达 300 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陆地国土的 1/3。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向海洋进军,发展了自己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模式,积淀了丰厚的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海洋性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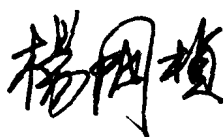
中华民族有光荣的海洋发展传统,也经历过从海洋退却的严重顿挫。向海洋开放,曾使中国传统的海洋产业、海洋贸易和海洋科技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厉行海禁,压抑向海洋发展的传统,曾使中国丧失海上竞争的优势,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走向海洋与忽视海洋的选择,关乎国民经济和社会文明的全局,这是我们的先辈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换取的认识。

21 世纪将迎来海洋大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海洋发展战略,力图在新世纪抢占海上竞争的制高点。中华民族面临复兴海洋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贯彻、落实海洋发展的基本国策,重振海洋大国的雄风,不仅是海洋界、经济界和政府部门的事情,同时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积极配合。

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需要发达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国民海洋意识的普遍薄弱,植基于历史上重陆轻海的社会价值导向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发达。当代中国的海洋性研究虽在一些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取得突出的进展,但尚未出现海洋政治学、海洋经济学、海洋社会学、海洋法学、海洋管理学、海洋旅游学、海洋军事学、海洋史学、海洋考古学、海洋文学、海洋民族学、海洋文化学、海洋民俗学、海洋宗教学等的全面振兴,更没有形成多元综合的学术体系。沿海地区、海洋国土和中国人从事海洋活动的外海区域,蕴藏着大量中国海洋社会人文成果和信息,有待进一步发掘和阐扬。

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是一项跨世纪、高难度的理论工程,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海洋与中国》丛书有志为此做基础性的学术累积。首期出版的各册,都以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社会人文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先人向海洋发展的努力、成败和荣辱,在吸收消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民间和海上的各种中国海洋社会人文资料和信息,探索运用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架构,重新审视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的价

值,力争有所突破,为下世纪最终达到融合创新,重塑中国海洋文明奉献一分绵力。希望这一尝试能发凡起例,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帮助和支持,唤起更多人文社会科学人士的关注和投入。同时也希望它的出版,有助于全社会更新观念,提高对中国海洋发展重要性的认识,造成关心、支持、投入海洋发展的人文氛围,迎接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和海洋社会人文大发展的 21 世纪!



1998 年元旦

致读者

中国是个内陆国家,也是个海洋国家。

在中国移民史上,既有陆路移民,也有海洋移民。海洋移民包括海岸带和岛屿带间移动的国内移民与前往海外国家的国际移民。明清时期海洋移民到台湾和菲律宾,都是东洋航路移民,在中国海洋移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视野对海洋移民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一

首先,明清两代是中国向海洋移民的重要时期,而移居台湾与移居菲律宾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清初成为福建的一府,至清末置台湾省,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化属于国内发展;当时菲律宾受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统治,中国移民在菲律宾的发展属于国外发展。比较这两个移民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课题。其次,台湾和菲律宾的中国移民基本上来自闽粤,移民的时间也大致相同。移民牵涉到移出地和迁入地两个方面,当时闽粤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怎样?哪些因素促使闽粤出现大规模的海洋移民?作为接受移民的台湾和菲律宾,其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又怎样?其三,从

国际海洋移民的情况看，明清时期也是世界海洋移民大迁徙的时代。15世纪，整个欧洲都有商人和船员探测去东方的新航路。1486年，葡萄牙人巴托罗缪·迪亚斯(Diaz)报道说，他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这为11年后的华斯哥·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伟大事业打开了通路。1497年，华斯哥·达·伽马从里斯本出发，穿过印度洋，抵达印度的卡里库特(Cali-cut)。哥伦布(C·Columbus)于1492年发现了新大陆美洲。1519年，受雇于西班牙的葡萄牙海员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绕过南美洲南部，进入太平洋，并继续前进，横渡太平洋来到菲律宾。¹由于新航路的开辟，西欧列国的殖民活动兴起，伴随这个活动出现了大规模世界性的海洋移民。明清中国的海洋移民活动，是世界海洋移民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空前的世界移民活动中，中国移民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上这些问题不仅饶有兴趣，同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基于上述的考虑，在导师杨国桢教授的指导下，我选择“明清海洋移民台湾和菲律宾比较研究”这一课题，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²本书就是在此论文基础上写成的。

在给海洋移民下定义之前，首先要了解移民的定义。对于移民的定义，国内外的工具书和专门的著作中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西方的学者站在欧美的立场上，往往强调移民的国际特点，甚至以是否属于国际移民性质作为移民的指标。³葛剑雄教授等根据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特点，把移民界定为：具有

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⁴我们不同意西方一些学者把移民局限于国际移民的观点。在这里,我们采用移民的一般定义:指从甲地迁到乙地,或指从甲国迁到乙国,并且定居的人或人群。海洋移民是指通过海路从甲地迁到乙地,或从甲国迁到乙国并且定居的人或人群。

中国海洋移民是中国移民的一个流向,中国移民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早期历史之活动都以内陆为重心;开疆辟土,与异族异文化之接触,主要以陆路为主。然而,自宋代以后,海疆的开辟逐渐重要,以东南沿海地区为根据地的海外贸易与拓殖也渐受注意,而经由海路的文化接触更取代以前西向陆路的关系。⁵杨国桢教授指出:明清中外海洋势力在南中国海接触和碰撞,(中国)海外移民潮不断,成为国际移民中一股强劲的力量。⁶中国移民可以分为陆路移民和海洋移民两种,中国海洋移民有别于中国陆路移民。陆路移民可以分为国内移民和国外移民;海洋移民也可以分为国内移民和国外移民,在国内移民中又可细分为通过海路迁徙到沿海地区的移民和迁徙到岛屿的移民。陆路移民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海洋移民中的国内移民,如漳州人移居南澳与海南岛,泉州人移居三沙、平潭以及浙江的平阳县等地,⁷也不在这里讨论。本书讨论明清时期的中国海洋移民,所研究的范围仅限于海洋移民到台湾和菲律宾。

明清海洋移民台湾和菲律宾,我们把讨论的时间截止于1895年。这是因为1895年日据台湾,1898

年美统菲律宾。从1895至1911年期间,台湾被日本占领,菲律宾换了新的殖民者,其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拟留待以后研究。闽粤移民台湾和菲律宾,由于台湾和菲律宾的移民约有80%来自漳州和泉州地区,所以,漳泉移民台湾和菲律宾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二

关于闽粤人民移居国内岛屿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前辈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和学术范围提出一些观点和看法。

第一、海洋发展史研究的观点。

海洋移民与海洋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李亦国教授指出:如从地理区域的观念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其一是作为海外发展基地的沿海地区,其次是沿海的岛屿,再次是非本土的海外地区。这三个区域之间的问题互相构成密切的关系,对某一问题的了解,必能帮助其他问题的解答;而对某一问题的忽略,很可能导致其他区域研究的缺陷。⁸至于海洋移民,李先生从客观环境分类的立场,再加上时间的因素,剖析海洋移民适应的问题,把海洋移民分为本土移殖和海外移殖两类,海外移殖又可分为弱势客地文化与优势客地文化两种类型,在弱势客地文化里又分为殖民地时代与独立时代两个时期。⁹李先生对海外移殖环境适应的分类,对海洋移民的研究富有启发性。

第二、台湾移民社会研究的一些观点。

关于台湾移民社会的研究，李国祁教授于1975年提出了“内地化”的观点。¹⁰李先生指出：台湾自康熙时期归入清帝国以后，雍正以降，清廷所推行的政策，则为使其内地化，其目的在于使台湾成为中国本部各省的一部分。接着，他继续阐述其内地化的内容：大体而言，至19世纪中期，其西部已开发地区内地化几已完成，非仅设官分治与中国本部十八行省相同，甚至地方官亦大都是科举出身，社会上领导阶层已由豪强之士转变为士绅阶级，民间的价值判断与社会习俗均以儒家道德标准为主。内地化理论是在强调政治和社会文化层面之走向中国本部的形态，那么其研究的对象当然是包括台湾的原居民，即高山族和平埔族。关于台湾政治的内地化，他认为，综观台湾由光绪元年至十六年政治近代化的整个过程，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其政治措施的重心在于抚番拓垦与设官分治，故其政治近代化的目标是内地化，推动此一近代化的原动力是抵御外敌的入侵。因此，此时所谓的内地化是被视为抵御外侮的防御政策的一部分。更由于内地化，也造成台湾整个的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向前推进。李先生对台湾“移垦社会”的特色也有比较详细的论证，概括起来，有以下六点。首先，他认为台湾人口组合中平均每户人数颇高。其次，是男女人口比率悬殊。第三，是高度的人口及耕地面积增加。其四，是在人群关系上血缘性不及大陆各省浓厚，而地缘色彩更为强烈。其五，表现在生活层面上，赌博盛行，还有罗汉脚（流浪汉）的现象等。第六，是台湾社会的领导阶层多为意气自强的豪

强之士,较少文化较高的知识分子或士绅人物。¹¹

关于台湾移民社会的研究,陈其南教授于1975年提出了“土著化”的观点。¹²陈先生指出:“‘土著化’理论所要处理的问题和对象比较狭隘,其目的只在于透过社会群体构成法则的变迁来解释台湾汉人社会在台湾本土土著化的过程。在前提上,‘土著化’理论先认定初期的汉人移民之心态是中国本土的延伸和连续,到了后期才与中国本土社会逐渐疏离而变成以台湾本地为认同之对象。用来确定此种变迁方向的两个指标是:祖籍人群械斗由极盛而趋于减少,同时本地寺庙神的信仰则形成跨越祖籍人群的祭祀圈;宗族的活动则由前期以返唐山祭祖之方式渐变为在台立祠独立奉祀。”¹³至于土著化的学术意义,陈先生指出:土著化理论虽然是透过社会结构、族群关系和人群认同的意识的分析来阐明清代台湾汉人社会的转型过程,但该理论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以这个理论为参考,我们便可以探讨在同一时期来自同一祖籍的汉人在东南亚的华侨社会有没有类似台湾汉人社会的“土著化”过程。反过来说,早期台湾汉人和移民心态与东南亚的华侨有什么相同或不同之处?如果有所不同,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些问题对于研究汉人海外拓展史的学者而言,是相当有意义的。¹⁴

陈孔立教授对台湾移民社会的发展进程、移民社会的特点作了深入的研究,¹⁵在详细地比较了李国祁教授提出的“内地化”观点和陈其南教授提出的“土著化”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移民社会向定居社

会发展的模式是“双向型”的。他认为社会结构以祖籍地缘关系为主进行组合，是台湾移民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这个特征的变化，是社会转型的根本标志。在这个前提下，与社会转型相关连的某些历史现象，如宗族械斗逐渐取代分类械斗，超越祖籍人群的祭祀的出现，以及移民社会其他特点的变化，都可以作为社会转型的次要标志。他对台湾社会发展的模式提出一个初步的设想：它是双向型的，而不是单向型的，即一方面日益接近大陆社会，一方面日益扎根台湾当地。但它也不是“内地化”加“土著化”。¹⁶他认为：“‘双向型’的发展模式似乎比‘内地化’和‘土著化’的模式更加符合台湾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与此相适应的，把移民社会转型后的台湾社会称为‘定居社会’似乎也比‘土著社会’或‘文治社会’更加符合当时的历史特点。”¹⁷

近年来，武雅士（Arthur P. Wolf）、杨国楨、庄英章等教授共同主持的“福建与台湾两省风俗习惯的比较研究”（1989年），试图提出台湾汉人社区社会文化变异性的解释，他们提出三种可能的解释架构：一种是历史文化的假设，台湾社区的文化差异可能源自于原居地的母文化，如漳泉、闽西、粤北等地区之文化差异，所指陈的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延续。第二种假设则着重汉人社会移民拓垦过程中所面临的物质、经济环境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文化适应，这也包括与社会经济史有关的想法与假设。第三种假设是早期汉人移民与居于原地区土著居民的互动，认为土著文化也对汉文化造成相当的影响，在不

同地区的不同文化活动过程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行为,这是一种文化互动与族群接触的假设与解释。¹⁸这三种理论要讨论与解释的主要范围是现在台湾社会的情况,但与早期移民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对研究早期的移民社会仍具有指导意义。

关于台湾地方文化的形成,即汉文化与土著文化的接触,潘英海先生提出“合成文化”的概念。所谓合成文化,指“形成一种异于主流文化,亦异于弱势文化的地方性文化,并保持地方文化体自主性的一种文化创新过程;另方面是一种地方文化创新与繁衍的过程,是地方文化为了文化传承,并维护该创新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因此,我们无法将这种变异的文化体,归为主流文化或是弱势文化,因为事实上那已是一种新的合成文化。”¹⁹潘英海提出合成文化的理论,主要是说明在文化接触或融合时,不论是处于优势的主流文化,或是处于劣势的土著文化或移民文化,那都是一种文化形成过程中“地方化”的过程,所形成的文化是一种异于原来文化(不论是汉文化或西拉雅文化)的合成文化。

第三、有关菲律宾华人的研究及海外移民研究的一些观点。

菲律宾华人的有关论著很多,由于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对这些论著作详细的讨论。在这里,仅就与闽粤移民有关的研究成果作扼要的介绍。

在中国,近20年来,大陆学者比较重视对菲律宾华侨华人的研究,出版了一些著作。²⁰这些论著几乎涉及到菲律宾华侨华人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各

方面的内容，同时对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周南京教授指出：在菲律宾，曾经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华人同化于当地社会的过程，人数众多的华菲混血种的存在，以及华人在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日益菲律宾化，就是有力的证明。菲律宾华人同化于当地社会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必须引起有关各方的注意和妥善处理。²¹

在菲律宾，有关菲律宾华人的著作很多。施振民教授曾撰文专门介绍菲律宾书刊中有关华人的研究，可以说涉及了有关菲律宾华人的一切主要著作，并对这些著作一一作了评价。²²

关于菲律宾华人历史的著作，多数是根据西班牙文的资料撰写的，其中最重要的文件是由布莱尔(Blair)和罗伯特森(Robertson)译成英文并编入他们的百科全书式的专著之中。²³小亚芬树·菲勒斯(Alfonso Felix, Jr.)主编的著作，详细地介绍了1570年~1898年在菲律宾的华侨的情况。²⁴魏安国教授(Edgar Wickberg)根据国家档案馆的西班牙原始文件，撰写有关菲律宾华人的专著，²⁵揭示了西班牙统治末期殖民经济的基本变化，华人被允许自由地去其他岛屿收集土产供出口和出售欧洲的产品。他的著作，还涉及到菲律宾的华人移民问题、华人在菲律宾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各种影响华人社会的文化因素。施振民教授的著作²⁶对华人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他指出：“中国文化是海外华人社会的基石。菲律宾华人社会以中华文化建立其社团组织，而这个社会组织也成为维护和延续文化

的机构。传统中国的社团组织应用不同的法则作为结合的基础，其特点为型式可以在某一范围中转换。”²⁷

明清闽粤移民菲律宾，这与早期的中菲贸易有很大的关系。关于早期中菲贸易的论著不少，²⁸其中最主要的著作要算威廉·莱特·舒尔茨（William Lytle Schurz）的专著。²⁹该书记载沿太平洋航路进行的从中国的月港和广州港至墨西哥普鲁科港的海上贸易，马尼拉成为大帆船贸易的中转站，其中从中国至马尼拉的贸易则由华人进行。罗伯特·B·福克斯则从菲律宾考古记录看中国对菲律宾的影响。³⁰庄良有（Rita C Tan）教授发表一系列的论文和出版专著探讨菲律宾出土的中国古陶瓷，进而说明早期的中菲贸易关系和闽粤移民对菲律宾社会经济的影响。³¹

由洪玉华教授、吴文煊先生主持的“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近年来陆续地出版论文、专著和译著，³²探讨菲律宾华人华侨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此外，有些华人社会的资料及研究来源于华人社团的纪念刊，这些纪念刊的主编者都是比较有学问的人，他们编辑纪念刊虽然会受到该社团的一些观点左右，但总的来说比较忠实地记录了该社团创立和发展的情况，以及华人社会、经济生活的情形。例如行业团体、宗亲会、同乡会等的纪念刊。³³

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就菲律宾华人社会的研究提出有关的理论。然而，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

来,海外华人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国内外研究华人的理论也顺应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探讨海外华人大都要涉及到菲律宾的华人华侨,所以关于海外华人历史研究的理论,实际上也可以指导关于菲律宾华人移民的研究。

关于海外华人历史研究的理论,王赓武教授曾着重介绍了梁启超于1904年提出的“华侨殖民论”,以及中国学者不同时期研究海外华侨历史看法的转变。³⁴周南京教授则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梁启超先生于1904年提出的“华侨殖民论”、孙中山先生于1916年提出的“华侨是革命之母”的观点、英国东南亚问题专家弗尼华尔(J. S. Furnvall)提出的关于东南亚社会经济的“多元社会经济论”(或称“多元社会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华侨社会阶级论”、萧玉灿提出的“同一民族论”、1960年提出的“华人同化论”,以及王赓武先生提出的“东南亚华人三大集团论”和“外中国论”。由于周先生对上述观点已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³⁵笔者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以往学者关于海路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区域史的角度研究国内的海洋移民,从华侨史的视野研究国外的海洋移民。例如对海洋移民台湾的研究,往往把它当作台湾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对于海洋移民国外的研究,由于受西方学者的影响,往往强调移民的国际特点。因此,讲到中国海洋移民国外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华侨史。至于移民在什么情况下离开祖籍地、在移居地如何求得生存、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怎样、祖籍地与移居地社会经济

的互动等问题,则缺乏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说,以往的研究,未能把海洋移民放在国际移民以及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背景下,作整体和综合的研究。关于台湾和菲律宾移民社会和经济的研究,过去也有不少的学者作过专门的讨论。然而,他们的论述大多局限于对台湾移民社会或菲律宾移民社会进行个别的研究,没有把本土移民与海外移民置于一起作综合的比较研究,所以他们无法确切地把握海洋移民台湾和菲律宾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面所呈现的异同,无法解答形成不同特点的原因。由于缺乏对移民祖籍地社会经济环境的深入探讨,不能把握海洋移民的确切动机,更无法说明什么因素促使有些人移居台湾,另一些人移居菲律宾。对某一区域的海洋移民研究往往也顾此失彼,例如对菲律宾中国移民的研究,则把注意力集中在中菲关系、菲律宾华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至于闽粤移民对太平洋航路贸易的作用,以及明代菲律宾漳州移民居多,迨至清代菲律宾华人中泉州人却后来居上等问题,也未作深入讨论。因为他们缺乏对某些基本变项的控制,诸如:福建与广东、漳州与泉州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生产方式的差异等。所以他们无法说明闽粤移民菲律宾的差异,以及在菲律宾泉州人为何比漳州人增加得更快等社会现实。

以上诸前辈的研究成果,促使有关中国海洋移民的研究不断地深化。他们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展开研究的基础。不过,以往学者对中国海洋移民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上述存在的问题,本书拟作为

研究的疑点和难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化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探讨,丰富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理论,有助于学术界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史。³⁶通过海洋移民的研究,可以深刻地反映中国的海洋性,也就是说,海洋移民是中国历史海洋性的具体表现。

三

本书以中国海洋移民的主力——闽粤移民为研究对象,以台湾和菲律宾为研究范围,试图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视角,比较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社会经济发展的异同,探讨中国东南沿海社会文化传播到台湾和菲律宾所呈现的不同特点。

我们的研究拟突破以往从区域史的角度研究国内的海洋移民、从华侨史的视野研究国外海洋移民的局限,把海洋移民放在国际移民的大背景,以及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背景下,作整体和综合的研究。因为海洋移民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从地域上看,它牵涉到移出地和移居地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从移民的动因上看,祖籍地和迁入地经济推拉力的作用,促使沿海人民进行海洋移民。此外,海洋移民又影响闽粤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而闽粤社会对海洋移民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有巨大的影响。只有通过综合的比较研究,才能把握海洋移民台湾和菲律宾社会经济发展的特质和全貌。

在进行比较研究之前,我们注意收集基本史料。正史和地方史的资料是我们最重要的史料,³⁷包括实录、地方官员的疏奏、皇帝的朱批等。地方官吏